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句法观

李 侠 刘佳明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莫斯科语义学派在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语义研究中都有着广泛影响。纵观莫斯科语义学派, 各个时期理论有很多, 本文例举其中对莫斯科语义学派具有重要意义且彼此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几个部分: “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转换模式理论、语言整合性描写原则、理论语义学和新型词典编纂等, 并将部分思想置于与其相似的其他语言学理论对比中, 意在阐明其主要理论、原则、概念和方法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以此阐明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及其独特性。

关键词: 莫斯科语义学派; 整合性; 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半个多世纪以来, 莫斯科语义学派在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语义学研究中都有着广泛影响。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各个时期理论很多, 本文例举对莫斯科语义学派具有重要意义且具有内部逻辑性的几个组成部分, 分别是“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转换模式)理论, 语言整合性描写原则, 理论语义学(包括词汇语义表征和词汇系统性联系)以及新型词典编纂等, 并将相关理论思想置于与其相似的其他语言学理论对比中, 分析其主要理论、原则、方法和概念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以此阐释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及其特性。

1 莫斯科语义学派研究的基石——“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

“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是一种语言多层级的自动转换模式, 在对自然语言动态的、形式化的描写中, 模拟人类从“意思”到“文本”的编码能力和从“文本”到“意思”的解码能力。该理论将语言分为语义、句法、形态和语音四个层级, 其中句法、形态和语音又有深层和表层之分, 每一层级既有内部描写规则, 又有与下一层级对接的转换规则, 从“意思”到“文本”逐层合成、逐层转换, 最终得到合乎语法规则的语句表达式。И.А. Мельчук曾指出, “我们的理论基础是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 我们认为这个模式是其理论的自然发展”(Мельчук 1999: 17)。从“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的“深层”“表层”“转换”“生成”等术语的使用上, 似乎也不难看出“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深受N.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但前者不是对后者简单地模仿或追随, 两者在多方面体现出不同。

首先, 两者理论假设不同。两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 导致它们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异。生成语法主要在“假设—演绎”的基础上, 模拟人脑生成语言机制, 主要关注人类大脑的语言能力本身以及语言习得, 即人是如何获得语言知识系统的。语言运用不能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 因为语言运用并不能完全反映语言能力,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的创造性”, 人类大脑中存在类似“词库”和“演算程序”部分, 利用形式化的数学和逻辑语言寻求语言知识的推演性, 以求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充分而合理的解释。而“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

论基于言语交际的实际运用过程，模拟人类运用语言的潜在能力，注重语言材料的分析和归纳。它关注的主要不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心智能力，而是语言运用的能力，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作系统”，人类所要表达思想为“意思”，表达思想的形式手段为“文本”，寻求“意思”和“文本”之间需要建立相互转换的对应规则或关系。

其次，两者理论目标不同。生成语法不是为某种应用目的建立的理论，而是以揭示人类的语言能力或人类获得的语言机制为直接目标。在描写某种具体语言手段的生成语法时，主要是规定若干数量的起始“核心”句，通过转换，从中推导出其他句子，生成语法就是以此为基础构建而成。它是一个单向的转换生成系统，试图用一套明晰的语法体系生成语言中所有符合语法的句子，转换的两端是深层结构和表层合格的自然语言句，整个体系中更强调其“生成机制”。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产品主要有自然语言的形式化表征和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而“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从创建之初就主要服务于机器翻译，ЭТАП (ETAP) 机器翻译系统为该理论主要研究成果，目前已研制到俄英互译系统第四代，实现了对连贯文本的自动翻译。它是一个具有输入、输出和加工装置的双向动态“转换机制”，只要求将一个给定的意思转换成相对应的文本，“将语义表达式‘翻译’为等值的自然语言句，两端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转换关系”（张家骅 2014: 59）。作为一个“翻译装置”，从“意思”到“文本”历经多层级的转换，这个过程必须纳入关于一种具体自然语言的知识，包括具体词汇的全部语义、句法、构词、语用等全部信息的词典。因此，“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语言模式的理论产品除了机器翻译系统，还包括一部涵盖词位相关的语义、句法、构词、语用等全部信息特征的积极词典（词库）。

再次，两者形式化方式不同。生成语法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语言的精细化和形式化描写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N. Chomsky努力追求语言的严密公式表达，他的这种公式化表征方式建立在短语结构语法的基础上。生成语法中深层句法结构是短语结构规则在插入词汇之后的结构形式表征。而“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建立了从语义到深层句法再到表层句法的多层级依存关系体系。目前在理论和计算语言学中，基于规则的语言模型主要有短语结构语法模型和依存语法模型（冯志伟，丁晓梅 2021: 17）。两者语法模型的不同，源于对句子中心的不同理解：短语结构语法认为，句子可分解为前后排列的组成部分，即“句子S=名词短语NP（主语）+动词短语VP（谓语）”；依存语法认为，主语和从属于谓语的其他体词性句子成分一起被列入同一范畴，动词谓语和主语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支配关系，即“句子S=动词短语VP+名词短语NP₁+名词短语NP₂…”。形式化表征深层句法结构时，短语结构树形图中，句子的每两个片段或者不相交，或者其中一个包含在另一个之中；依存关系树形图中根节点（通常是动词）不从属于任何节点，每个节点只能从属于一个节点。短语结构树具有直接反映句中词的线性顺序，拥有短语节点等优点；依存关系树具有直接反映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形式简洁，更利于反映词汇间的语义关系等特点。（详见李侠 2018）两种形式化方式相互借鉴、补充，如后来衍生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扩充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等，都十分注重中心词、句法功能、句法角色、词汇限制等依存语法概念和特征。（周明，黄昌宁 1994: 38）

最后，语言机制处理方式不同。两种理论处理语义和句法的关系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两者句子生成的底层结构不同。生成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的普遍语言能力是一种概念结构，它体现在句法中，因此N. Chomsky尝试以句法为中心探究普遍语法规律。从《句法结构》（1957）的句法自足到《句法面面观》（1965）所涉及和主张的子范畴框架（subcategorization frame）、语义的选择性限制，以及《管辖与约束理论讲稿》（1981）的题元理论（theta theory），语义在其语法体系中的比重虽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生成语法中居核心地位的从来不是语义，而是句法，N. Chomsky只是将语义看成句法某方面的限制或辅助。而“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中句子生成的起点就是语义，语义主要指句子中动词（谓词）的

语义，建立一套逐层描写、逐层转换的模式，是从动词的词汇意义中按步骤、逐级地推导出各层级名词性成分的代表情况。

2 莫斯科语义学派研究的理论原则——整合性描写

Ю.Д. Апресян曾说过：“为机器翻译系统提供理论支撑的‘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更重要的成果，我们认为是一种新型的语言学描写，即统一的或整合性的语言描写。”（Апресян 1995：577）语言整合性描写原则像一根线，串联起莫斯科语义学派各时期重要理论及其组成部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整合性描写要求，在描写特定自然语言时，把词汇的语义内容与语法规则系统有机地协调起来，融为一体。这里的语法是个广义的概念，囊括了与词汇语义相互制约的诸如词法、句法、搭配、语用、认知等在内的全部语义、形式特征¹以及相关的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派生词等内容。语言的整合性描写使语言研究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探究其背后深层语义的本质。

语言整合性描写原则下，语义与句法互动关系研究不可回避。（彭玉海 2001，2013）有关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如C.J. Fillmore（1968）、R. Jackendoff（1972）等逐渐发现了词汇语义和句法实现之间的规律性变化。莫斯科语义学派在关注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语言学传统的配位结构（диатеза）理论，配位结构从最初对形态领域描述态范畴的一个辅助性概念扩展到了语义-句法、语用甚至类型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И.А. Мельчук, А.А. Холодович首次厘清了配位结构与态概念的区别，明确配位结构指语义配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与（表层）句法配价的跨层级对应关系，用于语法范畴动词态的类型学对比描写。（Мельчук, Холодович 1970：111）鉴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角度，学者们对配位结构概念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中，配位结构扩展到了对深层句法的描写，配位结构被进一步定义为：“特定谓词语法形式的语义配价与其深层句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Иорданская, Мельчук 2007：188）；在“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词库《俄语详解组合词典》中，配位结构以表格“支配模式”形式清晰呈现语义配价、深层句法位与表层句法体现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描写词汇单位（лексема）所具有的配位结构的所有可能性。大多数学者的配位结构概念均不涉及深层句法层面（Апресян,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等 2010；Тестелец 2001）。Е.В. Падучева将配位结构引入到语用、交际层面的描写中，配位结构是情景参与者的语义角色与其交际位阶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配位结构各参数的变换，动词的词义会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具体说，配位结构变化可以用来区分同一词位的不同用法，同一个词的不同词位，甚至还可以区别不同的词（Падучева 2004）。

西方语言学中也存在类似配位结构的概念，称之为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论元结构最早可追溯至子范畴框架和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的题元栅（theta grid）。题元栅被看成是论元结构的最初形式，它纯粹是语义的，一度被看成是词汇语义所蕴含的语义角色清单（E. Williams 1981；A. Belletti, L. Rizzi 1988）。而后发展起来的论元结构理论很多对于论元结构的性质及其所涉及的层级性的讨论，对于其层级属性，一种观点认为，论元结构是词汇语义性质的，如J. Grimshaw主张将论元结构当作词汇概念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一个结构，它从词汇概念结构投射到深层结构（Grimshaw 1990）。还有观点认为，论元结构是词汇句法性质的，如B. Levin, H.M. Rappaport认为，从词库到句法结构，存在着两个表达层次：一个是词汇语义表达层，即词汇概念结构，一个是词汇句法表达层，即论元结构，这种情况下，论元结构主要包括谓词及所带论元的句法属性信息，包括论元数目、位置等，但不包括语义角色（Levin, Rappaport 1995）。论元表达的就是深层结构，所以深层句法结构不重要。再如J. Bresnan认为，论元结构是连接词汇语义和句法结构的纽带，在论元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不存在另一个句法层级，论元结构是一种语义-句法结构，论元结构和深层句法结构中冗余的不是论元结构，而是深层句法结构（Bresnan 1995）。无论上述哪种论元结构理论，核心观点均认为论元结构是动词语义投射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构式语法以新的视角研究语义

和句法之间的规律性对应。构式语法认为，句法结构本身可以像词一样，表示某种独立的意义，论元结构的实现形式很大程度上不能归结于动词的意义，而应归于动词词汇意义之外的构式意义（A.E. Goldberg 1995, 2003, 2006）。

配位结构和论元结构两个概念，源自不同的语言学传统，两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纵观莫斯科语义学派对配位结构理论的讨论中，配位结构一般不涉及深层句法，更多是针对表层句法成分与词汇语义成分之间的关系，配位结构根本上取决于动词的词汇语义特征。对于配位结构的层级属性及其是否构成一个独立层级的理论讨论，较少涉及。配位结构研究采用描写和归纳的方法，更多是针对具体词汇或某类别词汇，进行配位结构及其变化的描写，意在探究配位结构与词汇语义、句法等相互制约的规律性问题。在涉及论元结构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认同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层级看待，论述中可见大量形式化描写、假设及推导。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在这个层级表征形式、层级内部结构及支撑该结构运作的机制和语法约束规则等（顾阳 1994: 10），意在揭示动词语义特性在论元实现中的作用，建立并解释动词语义和论元实现之间的关系。

与莫斯科语义学派配位结构一样，传统的论元结构都基于词汇研究语义和句法的对应关系，即认为词汇语义决定句法结构，沿袭的是自下往上的搭建这一分析传统，语义和句法具有模块性（modularity）。构式语法基于构式建构句法结构，词汇与句法不存在模块性，而是具有连续统特性。两种视角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虽然构式的意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而存在，但A.E. Goldberg并不认为构式能够自上而下地将意义强加给动词，因而无需考虑动词的意义；句子实现形式是动词语义和构式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两种视角相结合进行语言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认识跨语言中语义和句法规律性联系方面的共性和差异。

近几十年来，与莫斯科语言学整合描写思想相关的语义和句法形态规律性在跨语言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词汇（语义）类型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和俄罗斯语言类型学兴起的一个新方向。其中西方语言学中比较著名的为L. Talmy的词化类型研究，旨在探索语义和形式跨语言的系统性关联研究，根据运动事件中的“路径”在不同语言中编码方式的不同，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两种类型（Talmy 1985, 2000）。在莫斯科语义学派基础上形成的莫斯科词汇类型学小组（Moscow lexical typology group），将语义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词语的搭配限制来分析其语义上的差异，并发现词汇层面跨语言的规律，目前完成的研究项目包括“水中运动”义动词、“破坏”义动词、“旋转”义动词及“疼痛”的隐喻等。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整合性描写除了要求语义和句法之间的互动性描写，还要求对语义和除句法之外的词法、构词、搭配、交际等其他方面语法规则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互动描写。这一方面扩展了语义制约性的范围，另一方面更能反映词汇的系统性。整合性描写衍生了莫斯科语义学派另外两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理论语义学和新型词典编纂。整合性描写一方面提供一种研究方法，揭示出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为词典学提供词汇和语法材料；另一方面新型词典将这种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成果固定下来，它是整合性描写的成果体现。

3 莫斯科语义学派研究的落脚点——理论语义学

整合性描写要求揭示出词汇在词法、句法、构词、搭配、交际等各方面的特征，并从中找出语义根据，这就需要强有力的语义理论作支撑。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语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语义元语言表征和词汇意义系统性联系方面。

3.1 词汇语义的元语言表征

语义元语言是“释义或解释概念的最简词汇，它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技术术语或逻辑符号等其他表达形式”（李炯英 2006：16）。目前很多当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涉及语义元语言的探索，元语言根据表征方式主要区分为以对象语为基础的自然语义元语言，莫斯科语义学派和以A. Wierzbicka为首的波兰语义学派元语言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以离散特征和函数为基础的代数结构元语言，概念语义学以R. Jackendoff等为代表。

A. Wierzbicka早年追随莫斯科语义学派，研究范围从词汇语义学、语法结构、词典编纂到语言类型学、文化语用学等领域。R. Jackendoff为N. Chomsky的学生，遵循的是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比较来看，A. Wierzbicka与莫斯科语义学派同为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两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三种元语言理论在元语言构成和诠释方法、表征对象、研究目标等方面区别明显。

三者的元语言构成不同，这体现在元语言词汇、句法及诠释方法上。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自然语义元语言词汇由语义单子（语义基元，*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имитив*）和过渡性语义单位（*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слова-смыслы*）构成。语义单子是不能被其他词位释义的单位，数量有限，且大部分可为世界各国语言所共有，它们是各种类型的语言单位释义都需要的单位。过渡性语义单位在意义上比语义单子复杂，经历若干步骤的分解可最终还原为语义单子。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元语言释义时尽量使用语义容量大的模块，即过渡性语义单位，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繁冗。A. Wierzbicka的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itive, semantic prime*）具有语义普遍性。语义基元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其他语言表达形式，如固定短语或黏着语素等，目前确定了65个语义基元词（C. Goddard, Wierzbicka 2009）。对于元语言词汇是否包含类似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过渡性语义单位”的成分，波兰语义学派经历了一个过程。A. Wierzbicka早期曾认为，语义元语言词汇组成只限于有限的具有普遍性的语义基元词。21世纪初，语义分子（*semantic molecules*）的概念进一步完善，创立了语义分子理论（C. Goddard 2010；C. Goddard, Wierzbicka 2014），形成了“双层语义元语言理论体系”（C. Goddard, 李炯英等 2021：21）。语义分子具有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在释义复杂概念过程中同样为语义上的“建筑材料”，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过渡性作用。莫斯科语义学派和波兰语义学派的元语言表达是在自然语言句法结构基础上构成的分析型句子。R. Jackendoff的元语言词汇代表概念基元，概念基元的数量有限，是人脑内在的、天生的，涉及一些主要的本体范畴，如事物、情状、事件、时间、地点、方向、行为、特性、方式、数量等（Jackendoff 1983, 1990）。元语言表达的是语言抽象的概念结构，有更多的范畴函项，把自然语言使用和谓词算法、内涵逻辑连接起来（张连文 2007：48）。

三者的元语言表征对象，即元语言表征的语义层级不同。“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理论时期尚未涉及语义层级性。И.А. Мельчук认为“深层语义属于概念描写层次，并明确指出概念描写是独立于具体语言的，它本身并不属于‘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模式的结构层次”（Мельчук 1999：XI）。也就是说，“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模式的语义层中由语义基元等构建的语义图式表征的是浅层语义。Ю.Д. Апресян指出，“我们在自然语言语句的意思中发现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语义特征，民族语义特征和普遍语义特征”（Апресян 1995：19）。并把对象语语义元语言的解读对象仅限于特定的民族语。A. Wierzbicka的对象语元语言体系具有泛语际的性质，但可以任何民族语为语义描写的对象。正如Ю.Д. Апресян所言，“在现代语义理论学家中，可能除了A. Wierzbicka之外，没有人研究如此深层的语义结构。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是比较表层的语义语言”（Апресян 1995：19）。R. Jackendoff所构建的语义结构中的基元是概念，而不是词语。他对语义结构和概念结构不作区分，他认为语言概念结构的这一层心智表征就是说话者在大脑中对这个世界的构建（董燕萍 1997：86）。

三者设置元语言的研究目标不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一方面旨在确定和展示词典中各词位之间体系性语义联系，包括同义、反义、互换、常规性多义现象和语义派生现

象等，另一方面构成表述意义相互作用规则的基础（Апресян 2005），特别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确定配位结构中语义配价和句法形式的依据。波兰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构建起一套具有普适性的语义描写体系，试图解释所有语言的基本语义，有助于发现和分析蕴含在复杂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特质，揭示不同文化的语义共性（李炯英，李葆嘉 2007：68）。受认知语法学派的影响，R. Jackendoff寻找普遍适用的语义基元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语言间的可译性，而是试图发现词汇意义背后的概念结构（Jackendoff 2002, 2010）。概念结构与语言密切相关，同时它又是认知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Jackendoff 2002：123），目的是处理“语言模块同感知觉等其他认知模块的关系以及语言内部句法、音系和语义等模块之间的关系”（周长银 2016：432）。

3.2 词汇意义的系统性

“自然语言的词汇意义是有系统性的，虽然在总体上比语法的系统性程度低。”（Апресян 2005：2）词汇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谓词的分类系统层面。

词汇意义的系统性体现在其动词的分类体系上，分类体系主要是指在事件结构基础上所作的谓（动）词的基础分类（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предикатов）。莫斯科语义学派在对词位语义进行元语言释义时，通过层级的分解，最终还原为行为（действие）、行事（занятие）、影响（воздействие）、过程（процесс）等语义元素，这些元素被称为系统性构成意义。拥有系统性构成意义的词汇往往在句法、形态、搭配等特性上表现出一致性，从而使这些特性在语义上具有相对很高的理据性，因此可实现对拥有相同系统性构成意义的词汇在语义、句法、形态、搭配、超音质等特征方面用统一模式描写，这就是词典释义类别（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тип）的由来。词典释义类别（基础分类）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词汇语义系统性的重要体现，其具体含义是“指一组相对而言联系较为紧凑的词位群，它们具有共同的韵律特征、词法、句法、语义以及搭配性能等特征，因此需要统一的词典描写”（Ю.Д. Апресян 1995：486）。词典释义类别具有如下特征：（1）同一词典释义类别中的词位应为同一词类；（2）存在一些词汇量较少的词典释义类别，它们是在语法性能的基础上进行确定的，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语义基础；（3）词典释义类别是一个多层级交叉的类别。

与词典释义类别相关的动词最具影响的分类，要数 Z. Vendler（1957）按照事件内部的时间分布特征所作的动词四分法，它被认为是动词分类研究的基础。D.R. Dowty（1979）尝试用 DO, CAUSE, BECOME 等语义元素表征事件结构中“状态”“活动”“完成”和“成就”等概念。此后，动词事件表达式中普遍采用“致使性”“施事性”“起始性”“静态性”等语义元素替代传统的题元角色（Jackendoff 1983；J. Pustejovsky 1991；B. Levin, H.M. Rapoport 1995）。还有一种分类针对的是包括动词在内的所有词类词汇。主题类别（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或称语义场类别，这个主题类别的划分纯粹依据表义层面，而不与语法规则发生联系，如名词“热带植物”“淡水鱼”“矿物质”等语义类别的划分。对于动词，它以共同的义素将动词联合起来，并在词义结构中居中心地位，且同一主题（语义）类别动词在句法搭配、语义衍生等方面可能会表现出共性。这样的动词，其主题类别的划分可能与词典释义类别的划分重合，如“感知”义动词、“创造”义动词、“拥有”义动词等。但也存在一些词汇，如不定向运动动词、未完成体定向运动动词等，它们在词法、句法、语用、语调等方面体现出来某些共同属性虽然在语义上无共同特征，但都可与表达具体行为过程的动词构成在性、数、人称以及体、时、式形式上一致的句法结构，以此也可聚合为相应的词典释义类别。

相比之下，词典释义类别所依据的基础类别划分也基于事件结构类型，根据动词意义中所包含的常项（constant），反映事件结构，由此和特定事件类型匹配。词典释义类别并不仅仅是动词的分类体系，它更注重揭示隐含在语言单位背后的系统性规律，秉承了莫斯科语义学派一贯的语义和语法相结合的整合性描写原则，它尝试将动词事件类别划分与词汇释义、

词典编撰统一在一起，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语言学词典化研究的需要。

词位意义除了根据系统性构成因素归入特定的词典释义类别，还有大量的词位彼此无法形成类别，词位之间还会有各种聚合、组合等庞杂联系。词汇单位之间的这些联系可以通过聚合、组合词汇函数反映。词汇函数指一组词位X与另一组词位Y之间的特定抽象语义关系 $f: Y=f(X)$ ，其中f是词汇函数的名称项，代表特定的抽象语义类型（Мельчук 1999: 78），如“同义”“反义”“第一题元”“极端特征”“良好特征”等，用相应拉丁语词的缩略形式标记：Syn, Anti, S₁, Magn, Bon等。纷繁庞杂的语义关系可最终归结为70种词汇函数。词汇函数可以反映词汇语义单位在聚合层面上的同义、反义、转换、派生、属种等关系，如Anti(надежда)=безнадежность；组合层面上的述谓—题元关系，如S₁(продавать)=продавец；语义一致关系，如Bon(климат)=приятный；“非完全自由搭配”的熟语性搭配关系，如Magn(тьма)=кромешная。词位通过词汇函数将与其有各种各样语义关系的其他词位像一张网一样，“编织”在一起。

4 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原则的实践——新型词典编纂

词典被看作在整个语言描写中除了语法之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莫斯科语义学派长期遵循语义理论与词典编纂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以自然语言材料为基础构建语义理论，再将这些理论以语义词典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词典编纂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理论的词典化过程。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有成熟的词典学产品与之对应，也使得其理论语义学原则和思想在词典的各板块描写中得到贯彻和应用。

“意思⇌文本”模式理论的词库《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1984)中词位释义使用的是自然语义元语言，句法语义关系采用多层次支配模式(配位结构)加以呈现，词汇函数用以描述语言系统中与该词位发生组合、聚合关系的其他词位。《新型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2003)聚焦俄语中的同义词，研究俄语各同义词列中各成员的共同意义部分及其区别性特征，它的系统性还体现在，它使用大量语料来展现、论证在语义、句法、搭配、形态和交际—韵律特征等方面，分析各词位之间的差别，并且顾及同义词所有已知性能。《俄语积极词典》(A—3)(2014—2017)尝试在词典条目中呈现俄语所有积极词汇完整语言面貌，即每个词位都要对其语义、句法、交际等方面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世界范围内比较著名的词汇(动词)知识库有框架网(FrameNet)，它在C.J. Fillmore框架语义学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以被称为“框架”的概念结构为基本单元，框架由框架元素配置而成，涉及的词语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对每个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和句法组合的可能性进行了“配价描述”(Fillmore等 2005: 31)。国内存在几部比较有影响的词汇知识库。《动词用法词典》(1987)是国内首次将与动词连接的名词宾语按照(语义)格关系进行区分所编纂的一部词典。《动词大词典》(1994)和《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1994)使词语释义同题元关系相结合，“标志着国内在汉语述语动词的论元结构和题元关系研究方面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姚亚平 1997: 239)。《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以原则与参数语法为理论基础，对每个动词的组合关系从论元属性、题元角色的语类、题元角色的句法功能等方面作了详尽描写(参见陈群秀 2006)。《现代汉语语义词典》“基本采用了配价理论的模式，同时极大地简化了一般格语法的语义角色系统，以此作为对实词的搭配信息的描述”(王惠等 2003: 352)。国内的词典，无论是人读词典，还是大型的、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知识库，大多综合运用题元理论、格语法和配价语法几种理论，详细描述各类词汇单位的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重点在其配价模式、动词与名词短语关系类型以及相应名词短语的句法功能方面。莫斯科语义学派相关词典同样关注上述各项信息，但同时也注重对词汇语义的释义，及其释义内容与句法、形态、语用及交际等各方面特征的一体化描写，揭示其作为一个系统内在的关联性，这是因为莫斯科语义学派有从元语言释义到句法语义互动关系再到理论语言学词典化等一套成体系的相关理论。总的来看，各国语言学家都意识到建立词汇知识库的重要性，但莫斯科语义学派探索出一条词典

化的道路,相继有以整合、系统性为描写原则的新型词典问世,并注重理论分析和词典研究相互促进。

5 结束语

莫斯科语义学派最初没有受当时欧美盛行的排斥语义研究思想的影响,坚守住了语义研究这一阵地,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语言处理模型及其计算机应用、自然语义元语言表征、语义和包含句法在内的整个语法规则的互动关系、词汇意义的系统性联系、新型词典编纂等,思想各组成部分彼此联系,以整合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相贯穿;许多传统术语,诸如同义性、熟语性、支配性、搭配性等在其研究框架内也拥有了新的概念内容。莫斯科语义学派秉承了俄罗斯语言学优良的研究传统,研究扎实、细致,虽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却是世界语言学研究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

附注

1 词汇的语义、认知与形式句法特征相结合的研究方面,国内俄语界学者彭玉海基于整合性描写原则和方法,就俄语动词语义衍变中的认知隐喻语义错置、隐喻语义变异机制以及隐喻意义的形式实现等问题进行过详细分析和研究。(彭玉海 2018: 39—62, 124—139, 442—454) 彭玉海还将相关思想方法用于分析抽象的文化概念词语同动词之间的隐喻搭配,以帮助识解和揭示文化概念所蕴含的相关文化语义内容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象。(彭玉海 2020: 110—118, 208—212, 256—260)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5(1).
- [3] Апресян Ю. Д.,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М. и др.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словар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0.
- [4] Апресян Ю. Д.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5] Апресян Ю. Д. 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4—2017.
- [6] Ахманова О. С. 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Z].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66.
- [7] Иорданская Л. Н., Мельчук И.А. Смысл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 в словаре[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7.
- [8] Мельчук И. А., Холодович А.А. Залог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Исчисление) [J].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0 (4).
- [9] Мельчук И. 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Wien: Wiener Slavistischer Almanach, 1984.
- [10] Мельчук И. А.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 \leftrightarrow текст”[M]. Моск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11]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12] Тестелец Я. Г.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ий синтаксис[M].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РГГУ, 2001.
- [13] Belletti A., Rizzi L. Psych-verbs and θ -theory[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88(6).
- [14] Bresnan J. Lexicality and Argument Structure [A]. Paris Syntax and Semantics Conference[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15]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1957.
- [16]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 [17]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Dordrecht: Foris, 1981.
- [18]Dowty D. R.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A].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s PTQ[C].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19]Fillmore C. J. The Case for Case[A].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 [20]Fillmore C. J., Josef R., Collin F.B. 框架网络与语义、句法联系的表征[A]. 计算语言学前瞻[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1]Grimshaw J.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0.
- [22]Goddard C., Wierzbicka A. Contrastive Semantics of Physical Activity Verbs: 'Cutting' and 'Chopping' in English, Polish, and Japanese[J]. Language Sciences, 2009(1).
- [23]Goddard C. Semantic Molecules and Semantic Complex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vironmental" Molecules)[J].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0(1).
- [24]Goddard C., Wierzbicka A. Words and Meanings: Lexical Semantics across Domai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5]Goddard C., 李炯英等. 波兰语义学派的最新发展: 语义分子理论及其应用[J]. 语言学研究, 2021(6).
- [26]Goldberg A. E.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Chicago UP, 1995.
- [27]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J]. 外国语, 2003(3).
- [28]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9]Jackendoff R.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2.
- [30]Jackendoff 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 [31]Jackendoff R. Semantic Structur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32]Jackendoff R.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3]Jackendoff R. The Parallel Architecture and its Place in Cognitive Science[A].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4]Levin B., Rappaport H.M.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 [35]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4).
- [36]Talmy L.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A].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7]Talmy L. How Languages Structure Space[J].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2000(1).
- [38]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56).
- [39]Williams 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J]. The Linguistic Review, 1981(1).
- [40]陈群秀. 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在中文教学现代化中的应用设想[A]. 第六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 [41]董燕萍. 评介 Jackendoff 的《心智语言》[J]. 现代外语, 1997(6).
- [42]冯志伟, 丁晓梅. 计算语言学中的语言模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6).
- [43]顾 阳. 论元结构理论介绍[J]. 国外语言学, 1994(1).
- [44]李炯英. 从语义基元的视角比较 Wierzbicka 与 Jackendoff 的语义学理论——波兰语义学派研究之三[J]. 外语教学, 2006(5).
- [45]李炯英, 李葆嘉. NSM 理论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J]. 当代语言学, 2007(1).
- [46]李 侠. “意思⇔文本”语言学中的依存关系[J]. 外语学刊, 2018(4).
- [47]林杏光, 鲁 川. 动词大词典[Z].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 [48]林杏光, 鲁 川. 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Z].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 [49]孟琮等. 动词用法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50]彭玉海. 俄语动词(句)语义的整合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51]彭玉海. 语义语义的集成描写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52]彭玉海. 俄语动词认知隐喻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 [53]彭玉海. 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分析与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54]王 惠, 俞士汶, 詹卫东.《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的新进展 [A]. 语言计算与基于内容的文本处理[C]. 全国第七届计算语言学联合学术会议, 2003.
- [55]姚亚平. 中国计算语言学[M]. 江西: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56]张家骅. 建构详解组合词典的相关语言学概念再阐释[J]. 外语学刊, 2014(6).
- [57]张连文. 概念语义学与更简句法结合的研究纲要[J].中国外语, 2007(4).
- [58]周长银. 概念结构与平行构建理论及其最新进展[J]. 当代语言学, 2016(3).
- [59]周 明, 黄昌宁. 面向语料库标注的汉语依存体系的探讨[J]. 中文信息学报, 1994(8).

The Main Points of Moscow Semantic School Thought

Li Xia, Liu Jia-ming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Moscow Semantics School has a wide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semantics and even on the study of semantics in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various periods of the Moscow Semantics School, there are mainly the theory of “meaning \leftrightarrow text” model, 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integration description, theoretical semantics and systematic lexicography. This paper puts the relevant ideas of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similar linguistic theories, analyzes its main theories,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method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so as to clarify the main features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theory.

Key words: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ntegrality; systemabil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项目编号: 17JJD740005);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词典释义类别理论与汉语词典释义模式化研究”(17YYE4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侠(1981—),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义学、俄汉语对比; 刘佳明(1999—),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俄汉语对比。

收稿日期: 2025-02-25

[责任编辑: 惠秀梅]